

# 浙江高等教育的近代变迁

叶哲铭

(杭州师范学院教育系, 浙江杭州 310012)

**【摘要】**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浙江的高等教育变迁经历了发端、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发端期约在 1897—1903 年间, 以求是、育英两所新式书院的创办为起点, 发展期约在 1904—1926 年间, 以《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为起点, 各种高等专科学校迅速发展, 形成了以高等专科学校为主的办学格局; 提高期约在 1927—1949 年间, 以国立浙江大学的创办为起点, 经过 20 余年的变迁, 逐步形成了包含综合性大学、学院、专科学校的多样化格局, 并在全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关键词】**浙江; 高等教育; 近代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1—0090—05

近代意义上的浙江高等教育, 发轫于 19 世纪末。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 浙江高等教育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对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浙江高等教育变迁的考察, 探讨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希望能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将来发展趋势的把握。

## 一 发端: 1897 年的两所新式书院

1896 年, 林启由衢州知府调任杭州知府。他到任后不久, 深感杭州的旧式书院已不能满足社会变迁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革新势在必行。当时, 恰逢蒲场巷普慈寺罚没充公, 林启即与当地士绅会商, 并呈文浙江巡抚廖寿丰, 建议利用寺屋创办学堂。1897 年 5 月 21 日, 经廖寿丰批准, 求是书院正式开学, 由林启任总办, 第一批招收具有各级科举功名的学生 30 名。1901 年 n 月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 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 学额扩充至 120 人。

求是书院的课程大致包括三方面: 一是“化学及各种西学”, 二是“各种算学及测绘、舆图、占验、天文等”, 三是“外洋语言文字及翻译书籍报章等”。学生分成三班, “习过英文者第一班, 习过算学者第二班, 一事未习者第三班”, 礼拜一到礼拜六, 分班学习地理、英文、算学等课。(1) 可见, 求是书院从创办之初, 就十分重视各种实学科目和外语的学习。正教习美国传教士王令赓(E. L. Mat-otx)还制定了教学计划, 实行班级授课制, 因而求是书院带有较鲜明的西方近代教育色彩。这些特点使求是书院具有了近代学堂的性质。再从学生的出路考察, 大致有两端: 一是选送出洋留学。如 1898 年, 书院首批资送高才生 4 名赴日留学, 分习冶金、兵工、商、法 4 科; 1901 年派出 18 人赴日; 1902 年又资送 10 人赴日。二是选送国内大学深造, 如 1901 年曾选送院内学生 10 人于京师大学堂, 另有选派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习。由上可见, 求是书院主要是为学生接受近代高等分科教育作好预备, 是一所新式高等预科学校。

浙江宁波于 1844 年 1 月开埠后不久,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 B. McCarttee)和魏理哲(R. Q. Way)先后到达宁波传教。1845 年 10 月, 为了训练牧师及其传教助手, 达到“以学传教”的目的, 他们一起创办了浙江最早的西式男子住宿学校, 取名“崇信义塾”, 招收 30 名贫寒子弟免费入学, 并提供吃住。1867 年 n 月, 义塾迁址杭州, 更名为育英义塾。1869 年 7 月, 学校增设了科学和哲学类课程, 开始由小学向中学程度发展。1887 年, 义塾第一次举办了毕业典礼, 送出了中学程度的毕业生。1897 年, 学校改名

---

为育英书院,正科学制6年,设英文、化学两科,相当于高等专科程度。1902年学生增至85人,并将正科学制缩短1年,为今后发展为教会大学奠定了基础。育英书院这种由初等教育机构经由中等教育程度而发展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历程,标志着学校由“神圣”,(以培养神职人员传播福音为目的)向“世俗”,(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人才为目的)转变的开始。

在浙江高等教育的近代发端中,西方冲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冲击导致教会学校在浙江沿海登陆,并在省城发展为一所高等学校;也使浙江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堂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聘请外籍教师,着力于西学的传授。对于沿海省份浙江而言,西方的冲击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仅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我们并不能解释为何两所高等学校均以书院为名;为何育英书院不能坚持“神圣的”办学目标;为何求是书院着力于为旧式士绅更新知识结构服务……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影响同样深沉有力。比如“求是”以书院为名,不仅仅是一种免受保守士绅攻击的策略,更包含有一种继承古代书院弘扬文化、传播新知的希望;“育英”以书院为名,则表现出使自身也具有中国化色彩,从而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意愿。1904年,育英书院有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中中了秀才,校方深以为荣,(2)则说明教会学校也着重强调融入中国传统,以此吸引求学者。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浙江高等教育的近代发端,不是纯粹外力冲击的产物,而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传统”所包含的一切精华和糟粕都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加以继承或消解。

## 二 发展:专科学校成为主角

1904年1月《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正式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根据学制规定,求是书院于1904年正式定名为浙江高等学堂,实施高等预科教育。鉴于当时浙江省合格中学毕业生极少,浙江高等学堂先设预科。1908年,预科第1期毕业后,始设正科,分文、理两类;另设师范完全科(3年毕业),附设师范简易科(1年毕业)。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浙江高等学堂暂时停办。由于教会学校在传授科学课程和外语等方面占优势,因此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为育英书院的发展带来契机:1905年,在校学生增至115人,每学期有4—7名毕业生进入医药、教育、商业、海关、邮政等行业工作;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杭城西郊的新校址,并改名为之江学堂,学制定为4年。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需要大批法律人才,设法政专门学堂成为当务之急。1906年,浙江巡抚张曾敬育手筹办浙江公立法政学堂,次年春季开学,设一年半毕业的讲习科和别科两种。到1911年共招收了4届讲习科(约450余名学生)和两届别科(约270名学生)。与此同时,张曾敬又着手筹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8年两级师范学堂正式开学,优级部分设数学、理化、史地、博物4科。到1911年,优级部共招收了2届选科、2届公共科、1届图画手工专修科,共计400余名学生。

除了由地方官出面创办的专科学校外,还有一所民办的高等实业学堂。1905年7月,为抵制美英商人攫取浙江铁路修筑权的企图,浙江绅商在上海集会决定以民间力量自造铁路,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并推举汤寿潜为公司总理。1906年,铁路开工兴建,同年7月,为培养铁路工业人才,汤寿潜与公司副理刘锦藻在杭州创办铁路学堂,办学经费由公司支付。1908年改校名为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分建筑、机械、营业3科,招生240名。1909年营业科毕业70人,1911年建筑科毕业47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根据新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办学的实际情况,浙江的高等教育相应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包括停办、新建、升格诸多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浙江高等教育的格局。

1912年后停办的学校包括浙江高等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部及浙江高等工业学堂等,停办的原因则各不相同。新学制取消了高等学堂一级,而代之以在大学中各科自设预科,因此浙江高等学堂于1912年秋奉命停止招生,1914年6月停办。又据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师范教育令,两级师范学堂优级部停止招生,到1915年后学校完全改办初级师范。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则因经费问题而停办。该校的办学经费系浙江铁路公司支付,该公司属集股商办性质,沪杭铁路于1909年建成通车后,由于债务负担很重,每年亏损20余万元。这种恶劣的财政状况很难维持学堂的开办,因此,1912年机械科修业期满后,学堂停办。

1912年后新建的学校包括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和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前者的创办人是留日医科学生韩清泉,他于1912年6月

---

创办的医学专门学校在当时也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西式医专。1913年,医专增设药科,改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继续发展。同于1912年创办于杭州的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是浙江第一所实施军国民教育专门培养体育师资的学校,校董沈均儒,校长吕公望。学校设本科2年,选科1年半,到1933年停办时,共毕业学生29届1千余人。

1910年,许炳望在杭州创办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分机械、染织2科,招收高小毕业生入读。1920年省议会决定将该校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升格后,学校设电气机械和应用化学2科,学制4年,其课程仿美国工科学院制度。到1927年前,工专共毕业学生4届84人。1910年巡抚增镛在杭州创设农业教员讲习所,民国后改为中等农业学校。1924年,省议会决定将该校升格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学、森林2科,本科修业年限3年。1914年,之江学堂改称大学,自1917年暑假起,学制改为5年,其中2年预科和3年正科,设8个学门。1920年n月之江大学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律申请注册备案,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分文理两科共15个系,学校实现了由初级学院向完全大学的升格。从1920年到1925年,学校大学部学生从68人增至148人。到1926年,之江毕业生共218人。

经过调整,浙江高等教育提高了办学的专业化程度。以工专为例,仅电机专业本科就有积分、物理、制图、机械制造法、应用力学、电磁学、热力学、交流理论等25门课程,学生必须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才能学习这些课程,因此工专招收的都是正规的中学毕业生而不是科举旧学之士,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不胜繁重课程退学者很多。之江大学系科的设置也由粗转细。1917年学校改制后,共设宗教、国文及经训、社会学及历史、外国文、算学、格致、哲学、教育8个学门;1920年注册升格实行新学制后,分为文理两科下设15个系,其中社会学及历史学门则分设为社会学、历史2系,外国文学门分设为英国语言文学、现代欧洲语言2系,格致学门分设为生物、化学、地质、物理4系,并增设了天文、心理学2系。这种系科的分化也表明了专业程度的提高。

与发端期比较,发展期的浙江高等教育不仅在学校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在结构上,这一时期以各种高等专科学校为主,缺少政府办的综合性大学。之江大学的发展虽然走在前列,但毕竟是一所教会大学,其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地已成体系的教会中学毕业生。这种状况一直为教育界人士所忧虑,他们多次呼吁创办综合性的浙江大学。但各种计划都因经费、时局等原因无法实现。直到1927年以后浙江高等教育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 三 提高:综合性大学的创办和发展

1927年2月,北伐军克复杭州,同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建立4所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其中第三中山大学设在浙江。7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在原浙江高等学堂旧址正式宣告成立,蒋梦麟为校长。8月,省政务会议决定将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工学院,原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劳农学院(1929年1月改称农学院),两者并入第三中山大学;同时筹建文理学院。1928年7月,学校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同年8月文理学院成立并于秋季招生开学,由此奠定了综合性大学的基础。国立浙江大学的成立不仅打破了以专科学校为主的办学格局,而且提高了浙江高等教育的整体办学水平,之江大学独占鳌头的局面也由此结束。

1927年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推行“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在全国开展艺术教育运动。1927年12月大学院选择杭州西湖罗苑为校址,创办国立艺术院,由林风眠任校长,设国画、雕塑、图案4系,学制5年(其中预科2年,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

1929年,教育部认为法、医两科关系人民生命财产,至为重要,必须由大学来办,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堂即于是年停止招生,1931年停办。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也一度停止招生,但该校自创办以来一直颇有成绩,浙江省府也不愿其停办,每年仍照原预算拨款。经过争取,医专于1931年5月恢复招生,同年8月改为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度过困难期后医专规模继续扩大,到1937年多幢建筑落成,从此学生270余人一律住校,教师也增至62人。

1927年后南京政府教育部开始收回教育主权。同年8月,之江大学校董会决定向美国长老会提出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报告。然而,长老会不接受宗教课只能列为选修课、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应出于自愿等注册条件。1928年7月校董会因长老会停发经费而决

---

定学校暂时停办。1929年春,之江同学会发起复校运动,9月,学校正式复课。同年底,校董会以一票多数通过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决议,并将其办学宗旨阐述为:“遵照国民政府所规定之教育方针,用基督博爱、牺牲、服务等精神,造成道德化、学术化及实用化之人才,以供给社会之需要”。[阳]这一宗旨把基督教会的办学目的解释成与中国民族振兴的要求是一致的,并保证为中国的强大提供世俗社会需要的人才。1931年7月,教育部核准立案,定名为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下设6个文科系和4个理科系,有学生313人(含中学部),教职员44人。从此,之江被纳入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也更深深地融入到浙江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中。

1937年8月,中日淞沪战事爆发并迅速影响浙江,上述4所学校在战火逼迫下均于是年n月开始迁校。在其后的8年战争中,除了省立医专迁往浙西南山区外,其余3校都先后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迁移。抗战期间,省内各中学大都随省府迁往浙西南山区,许多中学毕业生由于经济及战乱等原因无法远赴后方求学深造。为此,1938年n月浙江省府决定筹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办大学应考虑永久性,又鉴于蒋介石曾有设立大学纪念浙江籍辛亥革命烈士陈英士之意,遂改名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英士大学分设工、农、医3学院于浙南丽水、松阳两县,其中医学院是兼并当时在临海办学的省立医专而成。1942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将学校改为国立,并将东南联大的法学院及艺专并入,同时将英士大学的工学院划出。1943年4月,省立医专脱离英士大学恢复独立,学校的医学院几乎名存实亡。英士大学在战争期间因办学历史短及调整过于频繁等原因,发展不快,直到抗战胜利后奉令以金华为永久校址,方稳定下来得以长足发展。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各校纷纷复员东归。其中国立浙江大学于1946年9月师生全部抵杭复校上课;私立之江文理学院1946年初先在上海复校,于同年秋在杭州母校恢复上课,但三、四年级仍留沪上课;国立艺专亦于1946年秋返杭,10月上旬正式上课;省立医专在1946年夏借西湖玉泉、灵峰等寺宇为临时校舍,先行复课;国立英士大学则于1946年度第一学期起在金华上课。

抗战爆发之初,之江文理学院先在上海租界办学,增设了工学院与商学院,学校因此于1940年4月向教育部呈文,请求核准设定文工商3学院及12学系,改设大学。教育部未予批准,但准许试办3学院。复员回杭后,之江于1947年3月再次提出改称大学的申请,教育部仍未同意。1948年6月,之江又向教育部申报,在省教育厅的协助下,教育部终于派人视察学校,并于1948年9月同意之江改称“私立之江大学”。

另外,1948年,省立医专也升格为省立医学院。

在这20余年的变迁中,浙江高等教育在诸多方面有所收获。

首先,西迁历程使各校师生获得了深入了解中国国情、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机会。战争迫使学校离开了通商口岸杭州,走出了带有西方色彩的“象牙塔”,辗转于赣、湘、黔、滇、川等内陆省份,把现代教育带入内地。对于私立之江文理学院而言,西迁使之得以真正作为中国的高等学校而融入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中。战争刚爆发时,之江在上海租界复校,希望凭借教会学校的特殊身份免遭日军侵扰。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之江便处于同国立大学一样的地位,因而也开始向西迁移。作出西迁决定本身即表明学校对自身作为中国高等学府的角色认同。而西迁后,两方面的情况使之江真正融入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其一,战争期间工程技术人才成为国家急需的人力资源。1943年,之江的工学院在贵阳设立分校,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和机构工程4个系,成为当时之江各办学机构中师资最强,办学水准最高,具备正规大学要求,并被重庆教育部准予备案的部分。其二,战争时期学校与西方教会的关系进一步松弛。江浙沦陷后,其传统生源—教会中学毕业生的数量锐减,已无法保持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学生,而只能更多地招收内地普通中学毕业生。在此形势下,之江的基督教色彩日益淡化,作为中国高校的形象得到了强化。

其次,在这20余年中,各校办学质量获得很大提高。从办学层次看,以培养通才为目的的综合性大学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至40年代末,3所大学已将学制规定的文、理、法、教育、农、工、商8院校全部设齐,并涵盖学制规定的绝大部分系科。从师资力量看,这20余年各校都极力聘请高素质的专家学者充任师资,教师队伍的规模日渐扩大。如20余年中在国立艺专先后任教

---

的约有“位教师,其中潘天寿、林风眠、刘开渠、雷圭元、丰子恺等皆为一时之选。又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这 20 余年中师资队伍急剧扩张,许多学术威望甚高的教授成为各院系的领导核心:数学系有陈建功等,物理系有王淦昌等,化学系有周厚复等,生物系有贝时璋等,工学院有王国松等,文学院有梅光迪等,农学院有卢守耕等,师范学院有郑晓沧等。此外,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著名学者也在不同时期到校讲学。一时硕彦汇聚浙大,教授副教授人数由 1936 年的 70 人增加到 1946 年的 201 人。再如国立英士大学,所聘教授中曹惠群、金问珠、陆志鸿、彭九生等人皆为国内化学、土木、冶金、机械等学科一的权威学者。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罗致的著名学者也不少,文学院有韦惠、夏承熹、马叙伦等,工学院有王篇、周正等,商学院有徐钟济、胡继缓等。上述各校所拥有的师资,在办学质量的提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最后,这 20 余年的发展,使浙江高等教育在全国的地位获得了提升。以 1945 年为例,全国 22 所国立大学在浙江有 2 所,22 所私立学院在浙江也有 1 所,另外在 17 所国立专科学校中有 1 所艺专,19 所省立专科学校中有 1 所医专。其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崛起是提升浙江高等教育地位的关键力量。除在前文提及的院系规模扩大、师资力量增强外,浙江大学尚在招生范围、科研水准等方面有突出表现。从招生范围看,抗战前浙江大学只在东南的苏、浙、皖、赣等省份招生,是一所区域性大学。在其后 13 年,其招生范围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川诸省,以至招收全国各地(包括东北 3 省)的流亡学生,成为一所全国性大学。科研上,浙江大学在动荡年代非但没有停顿,反而进入一个丰产期。科研上的突出表现使浙江大学在抗战时各大学入选学部委员的人数上仅次于西南联大。1941 年,外国报刊开始把浙江大学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并称为“中国四强”。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认为西南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1946 年 8 月美国外交部分派中国各大学赴美进修生名额中,清华、北大、南开、中大与浙大各得 2 名,其余 15 校各得 1 名。[4]这一切均表明,以国立浙江大学为代表的浙江高等教育已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格局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了。

经过 20 余年的提高,浙江高等教育摆脱了上一时期的落后状况,与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日益统一,与先进省份的办学质量也逐渐接近。在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后,浙江高等教育事业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达至成熟的境界,为 1949 年以后当代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 高时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z).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814—81.7
- (2) 朱有狱.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4 辑) (z).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27.
- (3) 曾柜生·私立之江大学简志(节录) (A)·浙江教育史志资料(第二期) (z)·坤 93·16·
- (4) 竺可桥竺可杖日记(第 2 卷) (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55.